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十一辑

要目

- 一、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乐天宇
- 二、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牺牲的我的父亲
王虎臣烈士……………王光汉
- 三、革命当流血 魂随日月施……………黄真
- 四、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陆敬
- 五、晋察冀边区在解放战争年代的科学
研究工作……………王林
- 六、回忆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六十年……………陶淑范
- 七、卖艺生涯(下)……………侯宝林
- 八、清慈禧太后篡窃政权之经过……………恽宝惠

北京出版社

• 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纪念 •

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

.....乐天宇 口述 (1)

赵庚奇 梁湘汉 整理

关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活动肖超然 (45)

缪伯英——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个女党员

.....陆彬良 丁 鹏 (63)

周恩来同志与哈尔滨市东华学校叶祖孚 (82)

附：周总理在我家丘 琴 (85)

•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

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牺牲的我的父亲王虎臣烈士

.....王光汉 (87)

附录：

王虎臣烈士一九一〇年日记摘抄..... (101)

革命鉴 (104)

烈士王虎臣先生墓志铭 (106)

革命当流血 魂随日月旋

——滦州起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白亚雨烈士

.....黄 真 (109)

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	陆 敬 (117)
谋炸摄政王余事	房少桥 (132)
宋教仁和畅观楼	周世贤 (135)

晋察冀边区在解放战争年代的科学研究工作

.....	王 林 (137)
关于北平音乐堂事件的一段小资料	许宝骥 (157)

回忆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六十年	陶淑范 (158)
卖艺生涯(中)(自传之三)	侯宝林 (179)

清慈禧太后篡窃政权之经过

附记：我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远因

.....	恽宝惠 遗 作 (223)
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	寇长城 (238)
东交民巷的由来和变迁	傅中午 (245)

我所知道的

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

乐天宇 口述

赵庚奇 梁湘汉 整理

初到北京和加入社会主义小组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北京大学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也成了新旧思想、文化论战的场所。当时的北大校长、民主革命派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罗致具有各种思想——主要是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如聘请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为教授兼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为教授兼图书馆长；聘请曾留学英、日等国的著名伦理学家杨怀中为教授等。杨先生原在长沙一中和一师任教，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他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直到逝世前，一直订阅一份叫《Out Look》的英文杂志。他很喜爱这份杂志，经常向同学们介绍里面刊载的有关欧洲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学说的动态，使同学们思想活跃，大开眼界。他还经常教导青年要具有崇高理想和改革社会的伟大抱负，对同学们有很大影响，在同学中享有崇高威

望。因此，当他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应聘来京后，他在湖南的很多学生也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抱着探索救国救民的理想，纷纷北上。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八月来京，经杨先生推荐，在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邓中夏、张昆弟、何孟雄等同志相继入北大学习。肖三同志来京后进法文补校，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我原在长沙一中，受教于杨先生，也在新思潮影响下，于一九二〇年冬来京，入骑河楼北大补习学校。在杨开智同志（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引导下见到了邓中夏、何孟雄等同志。我与他们在长沙就都认识。他们那时住在中老胡同五号公寓，已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纵谈天下大事。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一年初，有一天，中夏同志到开智的公寓里（西城太仆寺）对我们说：“你们两人再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个研究小组，你们年轻，就叫社会主义小组吧！”这时北大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在大钊同志领导下，主要由中夏同志联系，是在北大东斋（沙滩）和西斋（马神庙）的同学中组成的。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二十岁是个界限，不足二十岁的加入社会主义小组，二十岁以上的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此时，张昆弟、何孟雄等同志已开始做职工运动工作。我们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后，又结识了一位云南同学蒋文孝，共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推选杨开智同志为小组长。

当时中夏同志的主要工作在工人运动方面，经常来往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他回北京时，必定要来农大出席小组会，他要离开北京时，也必定要写信来安排学习和工作。他要组员每天和附近农民谈话，注意在同学中发展组织，也要从附近农村的进步

农民和小学教员中发展组织，扩大社会主义宣传。一九二二年，中夏同志为开展工人运动来到北京，住在中老胡同公寓，他打电话到农大学生宿舍，要杨开智和我去他的公寓，谈学习和工作情况。他谈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就要成立了，希望农大能成立一个支部。这样，我们就以农大社会主义小组为基础，吸收了李启耕(荣光)、左士(正元)、胡求仙等同志，共有团员八人，成立农业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简称S·Y·农大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是在北大三院(北河沿)举行的，到会的团员约一百人，有十几个支部。农大支部八名团员都参加了。会上，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报告，并献旗一面，上面写着：“深入群众，布尔什维克化。”地委书记何孟雄同志报告了成立经过和团务等。

后来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简称C·Y·农大支部)。一九二四年一月，农大共青团支部成员经过甄别后退了一个消极分子，其余的由团员转为党员。

中共北京地委的成立和地方大会的召开

中共“一大”以后，由于党员很少，北京只在北大成立第一个支部，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范鸿劼、高君宇、黄日葵、张昆弟、何孟雄、缪伯英(女)等。有一个总联络人邓中夏同志(不久即称书记)，同时还兼管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联络工作，负责召集会议、传达党的文件、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等。在一九二一年冬，党员发展到二十多人，团员三十多人。在

这年年底，正式成立“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市党的最早的领导机构。

第一任地委书记何孟雄（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三年六月）。组织委员何孟雄兼，宣传委员黄日葵。

第二任地委书记武止戈（一九二三年夏至秋）。组织委员武止戈兼，宣传委员何资琛。

第三任地委书记吴时英（一九二三年秋天三个月左右）。组织委员吴时英兼，宣传委员卓闾泽。

第四任地委书记刘伯庄（一九二三年冬至一九二四年秋）。组织委员陈为人（一九二四年起），宣传委员邓洁（鹤皋）。

第五任地委书记赵世炎（一九二四年秋，一、两个月）。组织委员陈为人，宣传委员邓洁。赵世炎同志一九二四年秋从苏联回到北京不久，就任地委书记，但不久（约一、两个月）就调去负责主编党的政治理论刊物《政治生活》。

第六任地委书记刘伯庄（一九二四年冬至一九二六年夏）。组织委员陈为人，宣传委员邓洁。

第七任地委书记李渤海（一九二六年夏至一九二七年十月）。

一九二五年前后，北京地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是党的组织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这时，全市已有六十多个党的支部，党员约五百多人。为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北京地委决定成立东部、西部、南部三个委员会。

（一）西部委员会：

委员三人，书记乐天字，组织委员陶季玉（后接乐任书记），宣传委员邓必开（邓洁同志之弟）。当时西部委员会领导范围包括西城和西郊农村。接头地点为西城工人俱乐部，地址在白塔寺西

后的苦水井。西部委下有十八个支部，党员二百多人，我能回忆起的支部的情况是：

中法大学支部包括卧佛寺、温泉中学、香山慈幼院三个党小组。支部书记是陈毅同志。调陈做国民运动工作后，另推选了一个书记，仍是中法大学的一个学生。

北京工业大学：支部书记江禹烈（福建人）。

美术专门学校：支部书记姚仲贤（云南人）。

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书记黄龙（湖南人）。

中国大学：刘惕庄同志、唐近仁同志先后任支部书记。

西直门火车站：支部书记王敬臣。

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二四年一月份，成立农大党的支部，有党员十余人，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下分两个小组，过一段时间发展到三十余人。一九二五年农大成立特别支部（总支部）。这时农大党员先后由地委调走十余人，我调任西部委书记。农大特支书记由詹乐贫担任。西部委成立时，农大全校二百二十多名学生，党员发展到四十多人，团员二十多人。特支下辖六个支部，三个支部为农大学生支部，三个是农村支部。三个农村支部都在西郊，有十几名党员。公主坟支部（原为党小组）书记马芝堂（公主坟私塾老师），大瓦窑支部（原为党小组）书记张永祥（大瓦窑小学校长），还有罗道庄支部。

（二）东部委员会：

书记陈宝符（或黄日葵）是北大学生，下面有三十个支部，党员约三百人，是三个部委中人数最多的，因为一些党的力量较强的学校，如北京大学、蒙藏学校都在东城。

（三）南部委员会：

领导的地区是南城商业区，包括前门外较繁华地区，党员比东、西两个部委员会要少，负责人记不清了。

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由于段、张反动政府大肆通缉共产党人，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三个部委员会进行改组，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李渤海被捕叛变，给北京地区党组织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使几百名同志被捕，北京地区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李大钊同志和王荷波同志相继牺牲后，中央指示由顺直省委（原属北方区委领导）代管北方区委工作。李渤海是山东人，北京大学学生，叛变后改名黎天才，投靠张作霖父子幕下，干反动的政治工作。

北京地委一九二一年冬建立后，根据大钊同志的意见，建立了每月召开一次地方党、团员大会的制度，简称“地方大会”。如有政治运动时，随时召开比“地方大会”范围小些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是大钊同志的一个创造，是我们党在初创时期建立的过组织生活的一种好形式。

“地方大会”开始在沙滩北大一个小教室举行。第一次大会到会六十多人，其中党员二十多人，团员三十多人。后来党、团队伍发展壮大，就改在北大三院大教室、大礼堂举行。

“地方大会”主要是领导同志做政治报告以及布置组织工作。“活动分子会议”的内容，除简短的政治报告外，多是研究、讨论、布置工作。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主要由大钊同志做政治报告。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北方区委正式成立后，主要由赵世炎同志做政治报告。每逢国内国际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或我党要发动一项政治运动，大钊同志首先向党团员做报告，帮助大家提高认

识，统一行动。世炎同志喜读外文杂志，他的政治报告，多侧重于国际形势及其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党应如何去对待这种形势。他做报告，不要草稿，但只要记录下来，稍加修饰，即是一篇完整的政治论文，在《政治生活》上刊出供大家阅读。

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一次“地方大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却。那天，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大钊同志没有坐车，打着一把雨伞，徒步来到北大三院礼堂。他身着蓝布长衫，外套马褂，一双白色布袜子套在裤腿外边，足着胶鞋，身上都被淋湿了。他脱下身上的湿马褂，只穿一身蓝布长衫，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给大家做报告。这种精神使大家都很受感动。当时大钊同志已是著名的教授，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可是衣着仍这么朴素，而又平易近人，这是多么令人可亲可敬啊！

大钊同志这次报告，是讲有关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对华声明”的问题。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建议，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和宣言，废除帝俄时代在华取得的特权，将帝俄侵占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

大钊同志做政治报告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对形势进行精辟分析，然后对时局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大钊同志说：苏联归还中东铁路，北京政府可能要接受，因为铁路在内地，不怕“赤化”，经营铁路又有利可图。而对乌苏里江以东那一大片土地他们可能不接受，因为那里十分荒凉，又怕有“赤色分子”。大钊同志愤怒地说：那些军阀政客，只顾他们做官发财，是不管老百姓死活和国家兴衰的。大钊同志要求全体党团员，要在工人、农人、学生和广大群众中广泛宣传，督促政府把

我国所有主权收回来。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大钊同志的预见。

“二七”惨案发生后，大钊同志也曾“在地方大会”上做报告，对“二七”大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做了正确的总结，对无产阶级英勇斗争至死不屈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还亲自领导开展一个善后救援的运动，抚恤被难烈士家属。中共北京地委曾派夏之栩（现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张锡媛同志等到西城和西郊各党团支部组织募捐。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们西部委员会党团员正在美术专门学校召开大会时，夏、张二位同志就走进会场进行募捐，到会同志都踊跃捐献。我们农大支部还以“农业革新社”（农大团支部发起的群众性外围组织）和学生会的名义，向同学、教授和广大农民做“二七”大罢工的宣传，同时向他们募捐了一笔较多的救援费。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由于党的队伍发展很快，因此，如何做好支部工作，提到党组织重要议事日程。这时期“地方大会”的重要内容除政治报告外，就是由地委书记报告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工作，交流经验。那时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负责同志报告后，有的同志补充发言，有的同志提出问题，要求解答，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会议最后由地委书记总结，当场决定执行，工作进展很快。当时在党组织教育和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党内养成一种见义勇为的好风气。党内许多同志都勇于负责，主动承担艰巨任务。

这一时期地委各部、委负责同志也常向“地方大会”报告工作。我代表农委汇报过农村党组织的情况。

记得张国焘夫妇被捕释放后，地委还专门召开一次大会，欢

迎他们。大钊同志没有出席。会议由地委负责同志主持并致欢迎词，还谈了当前支部工作问题。那天张国焘不肯发言，由他的妻子杨子烈讲话，介绍他们在狱中情况。^①

一九二五年秋天，北方区委根据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成立党校。北方区党的领导干部和活动分子每周都集中到那里上课，有关政治形势的报告和党的工作的部署，都在那里进行，“地方大会”从此就很少召开了。

北方区委第一个党校

在回忆区委党校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时，不能不首先追溯建党前后大钊同志在培育党的人才方面所倾注的巨大心血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大钊同志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他在“五四”运动中起的卓越作用，他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广大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五四”运动前后，他亲自培养和指引邓中夏、范鸿劼、高君宇、张昆弟、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大批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影响和教育了整个一代的革命者，使他们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同志一九一八年八月来到北京，经杨怀中先生向李大

^① 张国焘在敌人监狱中，叛变了党，供出李大钊同志为北方共产党负责人，张昆弟、黄日葵、高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女）等为共产党员。他趁我党当时还不了解他在狱中的真相，用革命的伪装掩盖了他的叛徒真面目。

钊同志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杨先生与大钊同志在日本同学。当时李大钊同志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斯诺：《西行漫记》）不仅如此，大钊同志还介绍毛泽东同志结识了当时正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同志，使他得到很大的助益。全国解放后，李达同志亲自对我讲过这件往事。李达同志和大钊同志曾在日本同学，他对大钊同志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十分敬佩。回国后，李达同志住在上海渔阳里，从日文转译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每译完一篇，都要寄给在北京的大钊同志，请他审核校正。

一九二〇年一月杨怀中先生病故。五月，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从北京护送杨老先生的灵柩回湖南板仓故乡，当火车抵达汉口车站时，毛泽东同志临时决定改变行程，由杨氏兄妹护灵回湘，他自己转道去上海拜会李达同志，可见毛泽东同志想见到李达同志的急切心情。毛泽东同志在沪期间，与李达同志广泛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中国的各种问题。这次会面使李达同志加深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和了解。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指定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小组和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均与这次会见有直接关系。我和开智同志曾提及此事，他说：“是的，火车到汉口后，毛泽东同志就和我们分手，单独去上海了。家父的灵柩是我们兄妹二人护送回板仓的。”

大钊同志在大力培养许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入党的同时，也很注意做争取和教育那些社会上层人士、大学教授的工作。象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一般人总爱把他们统统看成是军阀政府的帮凶和伴食政客，但大钊同志对其中一些倾向进步的分子肯做

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些非常的人物，有些甚至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加入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江浩、于树德、陈启修、卢继亭等同志。充分反映了大钊同志那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胸怀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江浩同志，河北省人，原为国民党员，曹锟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大钊同志帮助和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加入我党，以后在创建天津和玉田党的组织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并引导他的一家人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曾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起了别的同志起不到的作用，多次从敌人的监狱中把我们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一九二五年后江到张家口地委任宣教委员，对开辟内蒙党的工作做出贡献。他的唯一儿子江震寰同志入党后在京津线和唐山做职工运动，曾是青年团天津地委负责人，一九二六年在天津为革命英勇牺牲。他的一家不愧是光荣的革命之家。

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秋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李大钊同志为书记的北方区委，统一领导整个北方（包括京津、东北、西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党的工作。当时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中绝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但理论修养准备不足，比较幼稚。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训党的骨干，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北方区委在正式宣布成立的同时，决定创办党校，并电请中央调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罗亦农（罗觉）同志担任

校长。这是北方区委、同时也是全党建立的第一个党校，从而使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展到有计划的、能比较集中进行的新阶段。

从一九二五年秋至一九二六年春，“三·一八”惨案发生，党转入地下，党校被迫停办，在半年的时间里，党校共办两期。

第一期由一九二五年秋至冬天结束，办了三个月。地址在原石老娘胡同（现在西四北祖家街北边一个小胡同里）。这期学员主要是来自北方各省的党员干部，也有一些未入学的北京地委的党员干部去听课，共七十多人。开学那天，北方区委派了赵世炎同志等参加，为欢迎外地来京学习同志，举行会餐，肖三同志喝醉了。那时地委在羊尾巴胡同有一个招待所，由北方区委交通处负责人李启耕负责联系，对外是一个公寓，对内是交通处，挂着“李培德堂”的牌子，各省来京汇报请示工作的同志都先到这里接头，由李启耕同志介绍去住宿。外地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也住在这里。

第一期结束后，区委决定第二期扩大学员名额，因原来的房子狭小，容纳不下，就将校址改在北大三院靠操场的大教室楼上。第二期是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春，学员主要是北京地委党团员积极分子，北方各省也有少数同志参加，共二百多人。还有一些很年轻的团员参加，如李葆华同志、张晓梅（锡珍）同志等，那时在十五岁左右，每次都来听课，就坐在我的前面。

教员都是北方区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讲课的人和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大钊同志审定的。

大钊同志主讲农民运动。他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刻地论述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和优良传统，从秦朝

的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以及义和团、红灯照，一直讲到当时南方和北方即将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和我党当前应采取的路线。大钊同志每周讲课一次，每课一般二、三小时，有时有紧急事情要处理就讲一小时。这样一直坚持三个多月，从未间断。每逢大钊同志讲课，课堂都座无虚席，场内鸦雀无声，大家忙着记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大钊同志还曾把讲课的一部分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二月的《政治生活》上发表，毛泽东同志把它收作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赵世炎同志讲国际国内形势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陈乔年、陈为人同志讲职工运动。

肖三、卓闾泽同志讲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刘伯庄讲党组织的基本知识——生活、作风、纪律，以及党的支部工作等。妇女运动也由他担任主讲。

校长罗亦农同志到京后，有一次很好的讲话。但他没有担任课程，不久就调动工作了。

青年运动，这个题目是分别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中讲的，当时没有专门讲。

党校教学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每课讲完之后，给学员留下十几分钟时间提问题，教员当场解答。当时党校每周只在一、三、五三天上课，开创了一面坚持学习，一面坚持工作的制度；既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促进了当前的革命工作。

一九二五年，由于有些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牺牲，有些同志被派到各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们留在北京的子弟大都年幼，原来都在羊尾巴胡同北方区委招待所，为了培养这些革命的后代，

大钊同志倡议创办一所黎明中学（在西城太平仓附近）。这是党办的第一所青少年学校。校长是一个进步人士，大钊同志的朋友，少数行政管理人员是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士。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也向当时政府注册登记，课程设置与一般学校大同小异。党组织为这些青少年创造了公开学习的环境，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更好地学习和成长。如张锡媛、张锡珍姐妹（他们的父亲是保定车站站长），原在保定求学，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逃婚至北京，投身到革命大家庭中来，锡珍刚来时只十二、三岁，我们都叫她小妹，在党的培育下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这个学校也招收附近一些居民子弟入学（现在还有当时的学生健在），最多时达一百人左右。有一次引起反动当局注意，把校长叫去，查问一番，但没有发现问题，也就过去了。

陈为人同志与北京地区早期职工运动

当回顾北京地方职工运动历史的时候，我们深深怀念邓中夏、张昆弟、范鸿劼、何孟雄同志等，也深深怀念北京早期职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为人同志。为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我和为人同志是湖南省江华县同乡，后来又同在北京地委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现将他的事迹回忆出来，作为对这位党的好儿子的纪念。

为人同志一八九九年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百美尾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一九二一年初抱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当时西伯利亚一带，白匪盘踞，交通断绝，为人同志历尽种种艰难困苦和曲折才到达莫斯